

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问题、成因与对策

刘乃郗,洪碧霄,潘明睿

(外交学院 国际经济学院,北京 100037)

摘要:全球次贷金融危机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来,世界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的困境,通过宏观历史数据分析,发现这种长期停滞主要表现为7项特征事实:全球经济增长长期低迷、贸易增速总体下降、FDI较为低迷且结构分化不断加剧、发达国家面临通缩压力而发展中国家面临通胀压力、失业压力持续高悬、粮食危机频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研究认为,形成这种长期停滞的成因主要包括政府债务不断增长、世界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放缓、技术进步的推动力不断下降、新旧能源替代的产业冲击、世界产业结构迁移升级愈加缓慢、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加剧、世界各国财富分配不平等普遍扩大、单一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结构性矛盾、地缘政治风险频发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研究还认为,在解决所有约束之中,形成更加负责任的国际经济与产业合作治理体系,开展更为强劲的技术合作创新,积极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重视加强国际金融治理合作等,是世界经济增长突破长期停滞困境的关键问题,也是进一步带动其他长期内生动能不断增强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世界经济增长;经济周期;宏观数据;金融治理;技术合作;粮食安全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2)06-0033-16

Long-term stagnation of world economic growth: problems, causes and solutions

LIU Naixi, HONG Bixiao, PAN Mingru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reakout of the subprim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and the recent impact of the global pandemic COVID-19, the world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stagnant for quite a long time. Based on macro historical data analysi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is long-term stagnation has seven

收稿日期:2022-06-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AZD012);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智库类项目(3162021ZK01)

作者简介:刘乃郗(1986-),男,重庆丰都人,讲师,经济学博士。

characteristics: sustained sluggish economic growth speed, overall declining trend in trade growth, relatively low FDI and the intensifying 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 of FDI, deflationary pressures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nflationary pressur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stant high unemployment rate, frequent food crisis, and slowe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rate.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main causes of this long-term stagnation mainly include ten structural issues: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government debt, the aggravation of the aging of the overall world population, the slowdown of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capital level, the continuous decline in the driving force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industrial impact of replacing old energy with new energy, the increasingly slow migr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world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intensification of populism and protectionism, the widening inequality in wealth distribution all over the world, structural conflicts in the global monetary system that is dominated by the single dollar, and frequent geopolitical risks. In dealing with all these constraints, forming a more responsibl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carrying out closer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 actively reducing the inequality in income and wealth distribution, and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overnance cooperation are the four key issue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promptly for the world economic growth to break out of the stagnation. They are also important factors that further promote the continuous strengthening of other long-term endogenous drivers.

Key words: world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cycle; macro data; financial governance;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food safety

2008年全球次贷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步履维艰,各项宏观经济增长指标始终未能恢复到全球次贷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美国通胀高企、能源价格剧烈波动等冲击,使得原本就深陷泥潭的世界经济尚未经复苏就面临进一步陷入滞涨的风险。关于全球经济增长是否与为何陷入长期停滞的讨论也成为了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既往研究对于世界经济增长是否陷入长期停滞的事实尚无系统梳理,而对世界经济长期难以复苏的各种原因进行了较多的讨论,总体来看可以分为从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两方面。

一是从总供给方面寻找原因。部分学者着重从人口、能源、技术、创新等内生要素投入变化出发,讨论了其对潜在产出增长的影响^[1-9],认为造成世界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有:技术进步放缓、人口增长放缓、平均教育水平提升放缓等^[10-18]。二是从总需求方面寻找原因。部分学者

着重从有效总需求不足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认为长期停滞是由结构性需求因素所引致的一种时间相对较长的经济周期现象,主要原因有:极低的实际利率水平、长期低通胀环境、就业难以实现、人口增长缓慢和老龄化趋势造成的过度储蓄、收入分配状况不断恶化对消费的抑制、各国政府债务不断高企等^[19-28]。有学者还认为不应将当前世界经济存在较为普遍的需求不足视作短期现象,而是源于一些结构性、系统性、持续性的内生原因,这使得有效需求在较长的时期内难以大幅提高,从而造成了目前世界经济的长期困境;或者说,其认为当前世界经济所表现出的长期停滞现象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新的长经济周期现象^[16,25,29-33],是一种有别于工业革命至今经济增长高歌猛进的历史长周期回归。

学术界在使用宏观经济增长理论讨论这个现象时,发现很难用某种全局均衡增长模型一以概之。面对这样的问题,本文采取了一种更可行的研

究路径,即从宏观历史数据的经验事实分析出发,阐述了世界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的七项特征问题,深入探讨造成长期停滞现象的10个长期性、结构性成因,提出了世界经济增长突破长期停滞困境亟需采取的4个方面的对策。

一、世界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的七大问题

对宏观经济历史数据分析可以发现,世界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表现为以下七大问题。

(一) 经济增速的长期低迷

观察1961—2019年间世界经济增速折线图(图1)可知,在次贷金融危机前,世界经济增速多次下降至3%以下,但经济增速在第二年基本都能恢复至前一年水平,例如1976、1982、1993、1998和2001年。—是因为经济周期中的衰退阶段一般仅持续两三年时间;二是由于前一年增速下降后,第二年要实现更高的同比增速就会容易得多。在次贷金融危机下,2009年世界经济增速跌至-1.7%,为1961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速最低值。2012年以后,世界经济增速除2017年以外均低于3%,2019年的2.4%增速为次贷金融危机后的历史最低水平。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世界经济增速更加难以提振。由上可知,世界经济仍未进入整体复苏阶段,这与既往关于经典经济周期的经验认识大相径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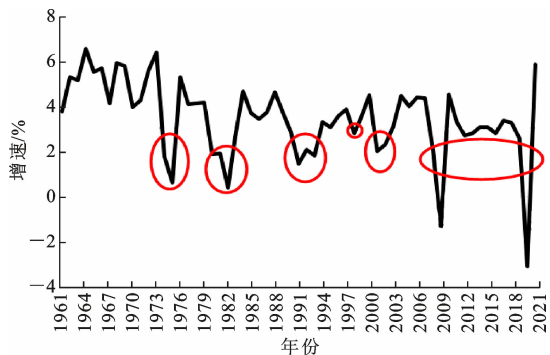


图1 1961—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基于2010年不变价。

(二) 贸易增速总体下降

观察1981—2019年间的贸易增速与GDP增速折线图(图2)及1990—2019年间全球贸易额占全球GDP的比重折线图(图3)可知,在2008年全球次贷金融危机之前的绝大部分年份中,世界贸易增速都显著高于GDP增速,是推动GDP增长的强大动力。而从2012年开始,世界贸易增速长期低于GDP增速,仅有2017年贸易增速呈现短暂的反弹且高于世界GDP增速。2020年以来,无论从供给冲击还是从需求冲击来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都将会带来比2008年更为严峻的世界贸易下滑^[34-35]。全球贸易增长明显减缓也显示出一系列国家间为应对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内顾倾向^[33]。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部分逆全球化的现象,例如英国脱欧事件对欧洲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发展的打击、特朗普任期内推行的反全球化政策主张。

(三) 全球 FDI 较为低迷,结构分化不断加速

第一,根据UNCTAD数据库中全球FDI流量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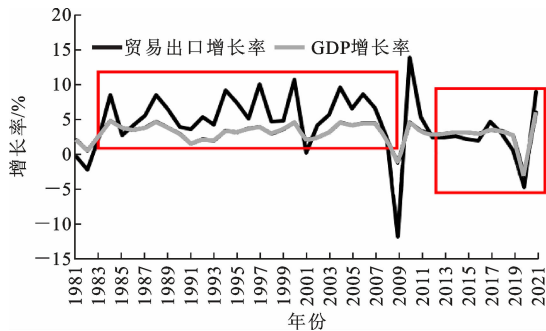


图2 1981—2019年全球经济及贸易增长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WTO数据库,基于2010不变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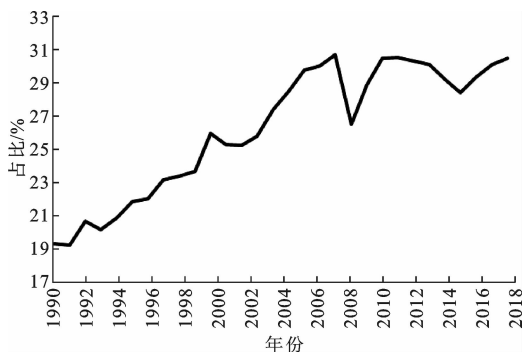


图3 1990—2019年全球贸易额占全球GDP比重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据与当年现价 GDP 数据计算可知,全球 FDI 所占全球 GDP 比重自 2007 年达到 3.3% 的阶段高点后,至今长达 15 年仍然未能恢复至 2007 年的水平^①,而由 1991—2019 年全球 FDI 增长率折线图(图 4)可知,全球 FDI 增长率自次贷危机后一直在较低区间波动,其中更多年份为负增长,表明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处于较为低迷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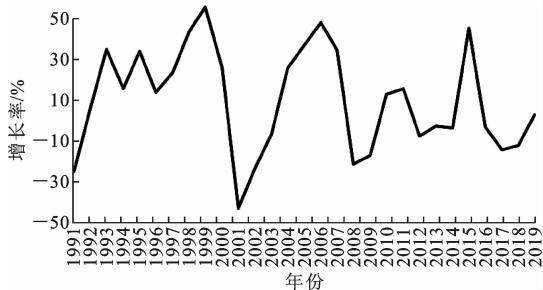


图 4 1991—2019 年全球 FDI 增长率

注:数据来源于 UNCTAD 数据库。

第二,全球投资率(国内投资占 GDP 比重)结构分化不断加速。由 1980—2020 年全球投资率比重变化率折线图(图 5)可知,在 2000 年以前,无论是发达国家组,还是发展中国家组,投资率变化均维持在大致相当的一致区间内。2000 年以后,发达国家的投资率不断下降,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不断上升,结构分化不断加速。这既代表着在不同经济体组别中的经济增长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分化,也代表着全球投资回报率和资本流动态势产生了巨大的分化。

(四) 发达国家持续面临通缩压力,发展中国家通胀依然较高

观察 2000—2019 年间全球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 CPI 折线图(图 6)可知,全球通货膨胀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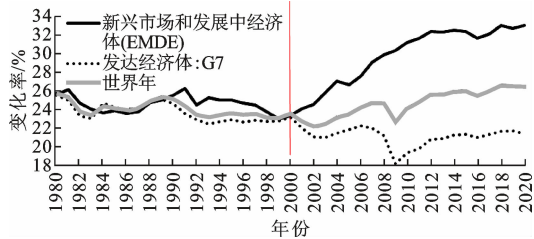


图 5 1980—2020 年全球投资占 GDP 比重变化率

注:数据来源于 UNCTAD 数据库。

在全球次贷金融危机以后整体下降了一个波动区间。其中,发达经济体的 CPI 自 2008 年全球次贷金融危机之后一直处于 3% 以下的水平,且大部分期间低于一般认为的最优通胀目标水平 2%^[20,36],甚至在多个年份低于 1%。在这种认识和预期判定下,发达经济体长期处于通缩压力之中^[37]。

不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可能利弊参半。弊在于这是受到了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利在于下降至 4% 及以下的通胀区间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更为有利^[38]。然而由图 6 可知,2009 年以后发展中经济体的 CPI 仍然远远高于 4% 的通胀水平,表明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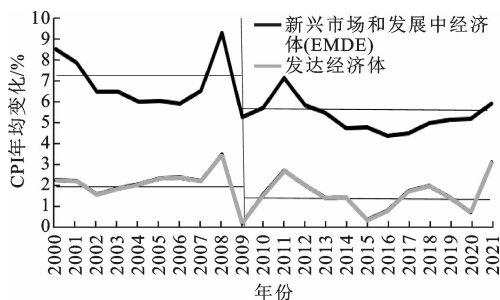


图 6 2000—2019 年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 CPI

注:数据来源于 IMF 数据库。

(五) 全球失业压力持续高悬

观察 2000—2020 年间全球 15 岁以上劳动人口失业率的折线图(图 7)可知,全球失业压力持续高悬。在全球次贷金融危机期间,高收入水平国家的失业率由 5.9% 上升到 8.0%,失业率增速达到 35.4%。中低收入国家失业率在 2009—2019 年处在缓慢上升状态。受 2020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低收入国家失业率由 5.4% 上升至 6.5%,高收入国家失业率更是由 4.8% 骤升到 6.8%,全球范围内失业压力再次高悬。

(六) 全球粮食危机频发,基本生存需求短缺加剧

观察 1990—2021 年间全球肉类、谷物和油料价

① 数据来源于 UNCTAD 数据库全球 FDI 流量数据 <http://unctadstat.unctad.org/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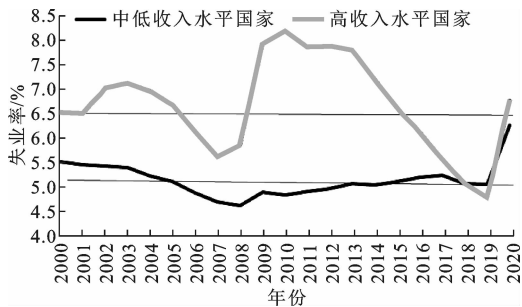


图7 2000—2020年全球15岁以上劳动人口失业率

注:数据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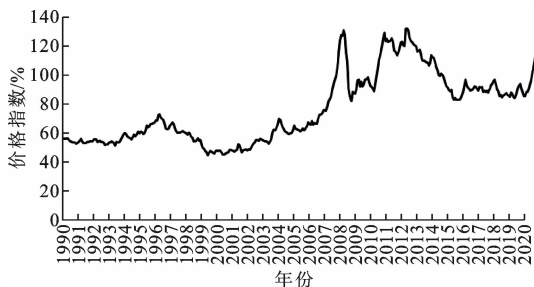


图9 1990—2021年全球食物价格指数

注:基于实际值,以2014—2016年的价格作为基期按100算,数据来源于FAO数据库。

格指数曲线图(图8)及1990—2020年间全球食物价格指数曲线图(图9),均可知全球食物价格总体呈上涨趋势且波动加剧,多次出现价格极高年份。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世界粮食署(WFP)等机构发布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有近6.9亿人口因粮食短缺面临营养不良问题,与2014年相比,5年间这一数字增长了6000万。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2020年全球蝗灾的影响下,预计2021年末全球营养不良人口将至少新增8300万甚至1.3亿,全球粮食短缺人口也将超过8亿。全球范围内食物价格的走高趋势制约了中低收入者的劳动积极性,也进而抑制了全球产业结构的有序迁移和循序升级进程。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粮食危机将进一步给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威胁。尽管粮食价格的走高也是造成世界经济增长停滞的不利因素,但粮食安全作为经济安全的最基础保障,粮食价格的走高代表着经济发展中最基本需求层面的生存环境正在日益恶化,更是世界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后的内生结果,从这个层面来看,其是世界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的重要表征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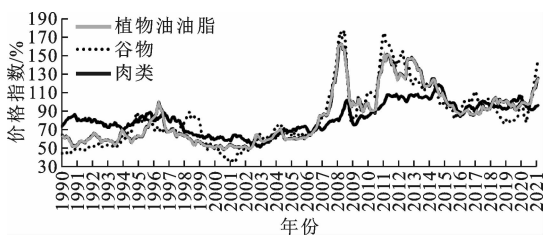


图8 1990—2021年全球肉类、谷物和油料价格指数

注:基于实际值,以2014—2016年的价格作为基期按100算,数据来源于FAO数据库。

(七)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

观察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以2020年GDP总量计)在1980—2019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曲线图(图10)可知,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次贷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范围内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佩恩世界表10.0版(PWT10.0)数据显示,在2020年世界GDP总量前十大经济体中,仅中国和印度两个经济体在全球次贷金融危机之后仍然保持着较为明显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放缓是世界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的重要特征事实之一。第一,从供给角度出发,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代表技术进步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水平,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性影响。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长期受到限制时,就意味着能够有效转化为经济增长并惠及整个社会的科技与制度创新进入到一个瓶颈阶段^[5,10]。第二,从需求角度出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会使得产出分配不断朝向资本回报累积,降低资本投资收益率,使得投资机会不断减少,进一步导致投资需求的疲软^[40]。

二、世界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的十大成因

造成世界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的原因很难用某个一般化理论模型一以概之,综合来看,主要包括10个方面的成因。从某种层面来看,它们既是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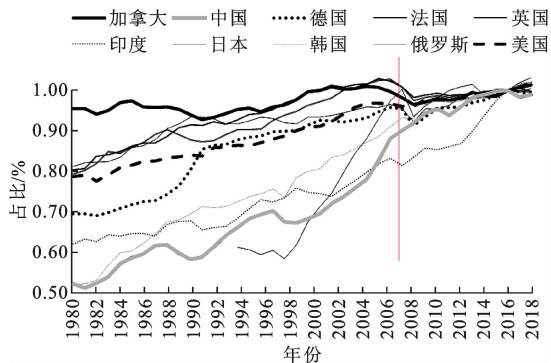


图 10 1980—2019 年世界 GDP 总量前十大经济体 TFP
注:以 2017 年的 TFP 作为基期按 1 计算,前十大经济体为按照
2020 年 GDP 排序,数据来源于 PWT10.0 数据库。

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的原因,也是世界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的结果,并进一步反过来加剧了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

(一) 政府债务不断增长

进入 21 世纪以后,世界各国政府债务不断增长。尤其是 2008 年全球次贷金融危机以来,超常规的宏观宽松政策导致各主要经济体政府债务规模急剧膨胀。高企的政府债务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导致私人部门的投资下降。同时,不断增长的政府债务高度依赖新增信贷供给或债务的滚动展期,政府收入中较大份额需要用于偿还债务本息,从而导致公共投资不足^[41],甚至引发债务危机进而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稳定^[42]。在现实宏观经济研究中,债务规模过大会对经济社会造成严重破坏已成为普遍共识,例如欧洲主权债务和日本政府高企的债务严重拖累其经济增长^[43]。以欧债危机为例,欧债危机使得国家再融资成本上升。2010 年欧债危机期间,在一年时间内希腊 2 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 4.2 个百分点,5 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 3.3 个百分点,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 2.1 个百分点。同时,欧债危机会从影响政府支出传导至居民消费与企业投资需求下降^[44]。

REINHART et al. 分析了 20 个发达国家在 1790—2009 年间跨越两个世纪的公共债务增长与长期实际 GDP 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发现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当政府债务

占本国 GDP 比重低于 90% 时,政府债务会对本国经济增长存在一定促进作用,当政府债务负担率超过 90% 时,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21]。其他学者的研究也发现政府债务的合理区间应该是在 90%—100% 之间^[27,45]。

观察 2001—2021 年部分 G7 国家及新兴经济体中央政府债务总额占 GDP 比重折线图(图 11)可知,进入 21 世纪以来主要经济体每年新增的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不断走高且持续累加,许多主要经济体的这一指标已超过了 90% 的红线。2020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世界各国的政府债务进一步累积。何德旭等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海量流动性和远超历史规模的资产负债表恐将成为全球第四次政府债务危机浪潮的引爆器^[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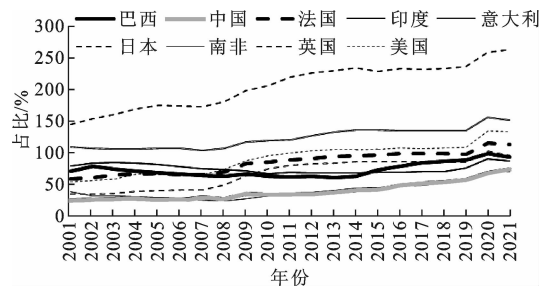


图 11 2001—2021 年部分 G7 国家及新兴经济体
中央政府债务总额占 GDP 比重

注:数据来源于 IMF 数据库。

(二) 世界人口老龄化加剧

观察 1990—2020 年间世界与高收入国家老龄人口比重折线图(图 12)可知,2020 年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是 9.3%,相较 2008 年的 7.4%,老年人口比重已经增加了 22.4%。全球 0—14 岁人口构成从 2008 年 27.4% 下降至 2019 年的 25.7%。其中,高收入国家的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更大。全球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主要是受到了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平均寿命延长的叠加影响。而老龄化引起的全社会劳动参与率下降和适龄劳动人口减少,都会使得世界经济增长的复苏更加艰难。部分学者也对这个问题从不同国家的经验出发,通过实证研究给予了论证^[6,46-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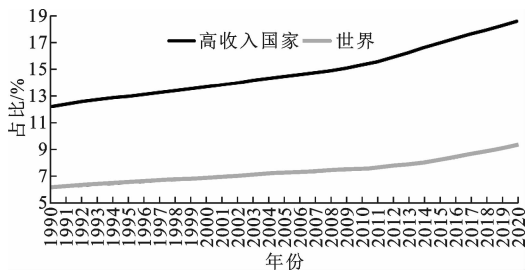


图 12 1990—2020 年全球和高收入国家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数的百分比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三) 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放缓

人力资本增长既是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弥补劳动力下降的重要因素,也是内生增长理论中的核心动力之一。面对世界老龄化加剧给劳动力供给带来的冲击,学界普遍主张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来缓解老龄化的冲击。ZHANG et al. 利用中国 1990—2005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发现在劳动年龄人口中,非熟练劳动力向熟练劳动力每转换 1%,人均产出会增加 1.43%^[4]。汪伟通过构建 3 期世代交叠模型,论证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能够减缓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7]。政府应通过加大高等教育的投入与激励来提高教育质量,同时扩大教育和培训资源覆盖范围^[9,33]。

世界范围内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速度正在放缓。这主要来自于两方面原因:一是次发达国家教育普及进步缓慢,观察 2010—2018 年世界范围 15—24 岁接受教育、就业或培训人口比例增速折线图(图 13)可知,世界范围内适龄教育人口接受教育比例的增速长期在较低水平徘徊,甚至在 2013 与 2017 年出现负增长。二是发达国家的教育普及率已经较高,高等教育入学率增长放缓,缺乏进一步实现人力资本的增长空间。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从 2005 年开始就已经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于 50%),而中国的高等教育入学比例从 2018 年开始也已经超过 50%,由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步入普及阶段^①。有学者认为由于发达国家劳动力质量的增长速度已经放缓,即便此时产生重

大科技创新,劳动力采纳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在短期内也难以跟上^[3]。观察 1992—2019 年单位劳动力产出增长率折线图(图 14)可知,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金砖国家的单位劳动力产出增长率先升后降,而非金砖国家的单位劳动力产出增长率在次贷危机后就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观察 1971—2019 年 G7 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速(图 15)可知,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G7 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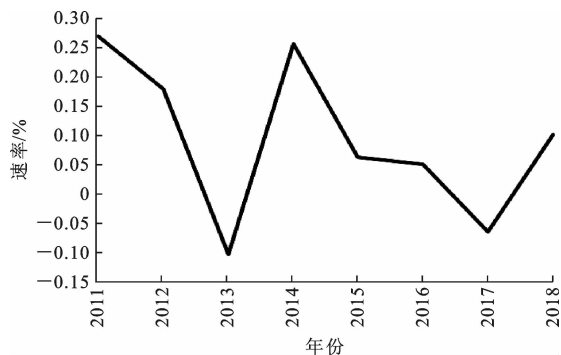


图 13 2011—2018 年世界范围 15—24 岁接受教育、就业或培训人口比例增速

注:数据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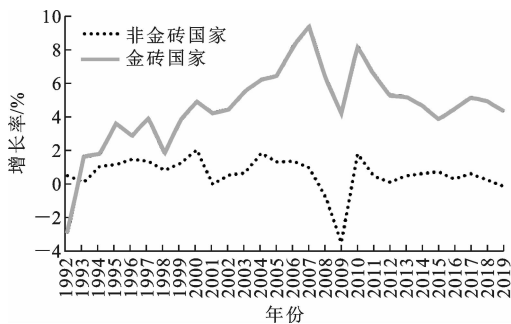


图 14 1992—2019 年单位劳动力产出增长率

注:数据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且基于 2010 年不变价美元。

与此同时,虽然人工智能发展可以弥补劳动力不足和人力资本增长缓慢短板,但是使得更多的劳动力尤其是中低技能劳动力面临更大的失业压力。CHUI et al. 在研究中预测,当人工智能系统可以达到一个普通人类的生产能力水平时,美国现有 58% 的就业将完全由智能机器设备替代^[48]。ACEMO-

①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18 岁—22 岁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与适龄人口之比, <https://data.worldbank.org.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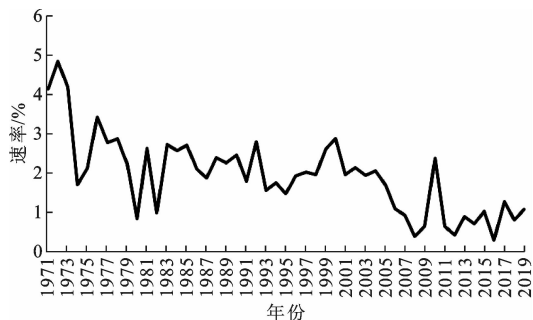


图 15 1971—2019 年 G7 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速

注:数据来源于 OECD 数据库。

GLU et al. 利用 1990—2007 年间美国相关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每 1 000 个工人所拥有的机器人数量增加 1 个,就会减少 0.18%—0.34% 的劳动需求^[16]。

(四) 技术进步的推动力不断下降

技术进步是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动力,也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1]。从 18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中叶,世界经历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从 19 世纪中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经历了以电力、内燃机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世界进入了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革命时代,并一直延续到现在^[49],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源于美国的互联网革命使得全球企业生产组织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观察 1950—2016 年美国潜在劳动生产率增速曲线图(图 16)可知,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潜在劳动生产率在 20 世纪 90 年代快速提升,表明技术进步带来了显著的生产率提升效应。然而随着互联网泡沫在 20 世纪末崩溃及 2008 年全球金融次贷危机的爆发,全球技术进步总体放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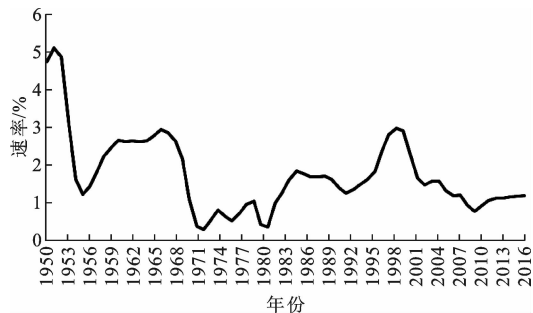


图 16 1950—2016 年美国潜在劳动生产率增速

注:数据来源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官方数据。

前几次工业革命对技术进步所产生的边际贡献逐渐耗尽^[49],目前科技创新长期处于黎明前的黑夜,尚未出现变革性的新技术^[50]。虽然人工智能、虚拟现实、3D 打印、无人驾驶、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概念不断涌现,但尚未出现能够像电气革命一样可以引爆经济社会全局发展的重大技术突破。COWEN 将这种科技创新不能有效地充分创造就业、促进生产率提高以及经济增长的现象称为“技术荒原”^[10]。CETTE et al. 认为信息技术革命的周期较短,真正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贡献的阶段已经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至 21 世纪初就已经几乎完全释放,当下的一些新经济新业态例如自动驾驶汽车、电子商务或网络共享业态,都只是应用已有的技术创新对传统产业的替代,无法产生如汽车诞生之初带来的公路建设、机械设备生产等更为强烈的产业创新活动^[5]。此外,技术创新依赖于不断的投入,而往往只有那些已经取得技术优势的企业才能持续投入创新,这使得技术创新本身正在趋向于集中,技术的扩散程度不断下降。以美国 2016 年的数据为例,前 1% 的公司注册了市场超过 50% 的新专利,占据专利转让 50% 以上的成交份额,技术扩散程度的下降使得技术进步对全社会生产边界的推动力难以充分释放^[15];新企业比例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15% 下降到 2016 年的 9% 左右,美国国内领先企业与跟随企业的生产率差距不断扩大,经济活力指数在进入 21 世纪后下降速度进一步加速^[51]。

(五) 新旧能源替代的产业冲击

观察 1985—2020 年间全球新旧能源消费量占总消费量的折线图(图 17)可知,新能源的消费比重正在不断升高,传统能源的消费比重不断下降。新能源的加入和传统能源需求下降,都使得传统能源价格不断下降。然而从产业结构来看,基于传统能源的下游产业占产出比重更大,这使得相关下游产业长期面临原材料价格下跌引起的通缩压力。尤其是次贷危机以后全球原油价格总体的下滑趋势(图 18)除了对下游经济形成通缩冲击外,也使得全球产油地区和国家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带来的更

为复杂的连锁反应制约全球经济的良性复苏。对美国而言,页岩油气革命使其成为能源大国,然而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国际石油需求骤降,短期的低油价会导致美国石油公司背负沉重债务,上千家石油企业面临破产,甚至引发经济危机^[52]。对俄罗斯而言,油价的下跌将会使其对外议价能力和财政收入面临压力,其石油出口收入每桶下降20美元,俄罗斯的GDP就会下降1.75%^[53]。对沙特而言,石油出口所带来的财政盈余是沙特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压舱石,长期的低油价势必导致国内社会动荡,甚至是中东地区动荡^[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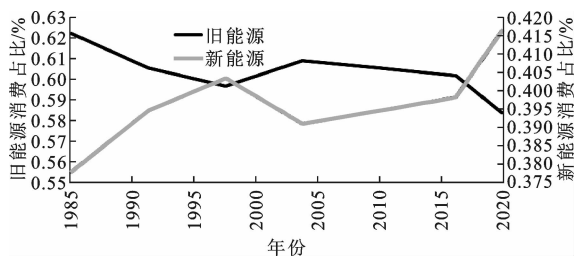


图17 1990—2018年全球新旧能源消费占总消费比重

注:旧能源表现在左轴(包括煤、石油),新能源表现在右轴(包括天然气、核能、水能、风能及太阳能、生物质能)。数据来源于IEA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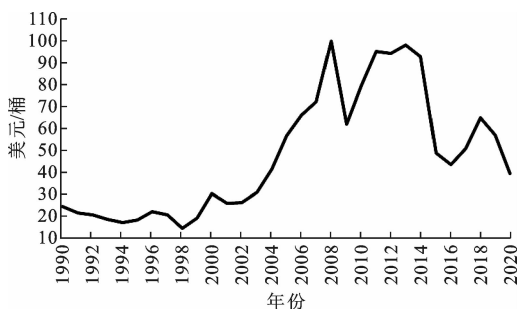


图18 1990—2020年全球原油期货价格走势

注:数据来源于EIA数据库。

与此同时,新能源对旧能源的替代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并没有带动下游形成更多新兴产业。这种简单的能源消费替代带来的边际技术替代贡献是快速递减的:随着替代程度的不断累积,新能源替代的难度和成本会快速增大,使得正向替代贡献减少^[55]。换句话说,当前进行的新能源替代造成了不利于短期经济增长的成本增加。可

再生新能源的高成本会进一步通过价格或税收的形式对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造成挤出效应^[56]。

(六) 世界产业结构迁移升级更加缓慢

一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使得劳动力等要素在不同产业中进行转移配置,进一步提振一国的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模式及成果^[57]。同样,对于世界来说,其产业结构的迁移升级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进程,国家间的比较优势会呈现出动态变化,不同国家通过承接比较优势产业和转移比较劣势产业,能够不断地优化全球生产组织中的资源和要素配置,促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迁移升级。如发达国家淘汰的低附加值产业先转移至中等发达国家,然后再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最后转移至最不发达国家,即世界经济理论中常说的“雁阵发展理论”。

观察1997—2019年发达国家和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第二产业占世界比重折线图(图19)可知,发达国家第二产业占世界比重不断下降,而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第二产业占世界比重不断上升,两者正好在次贷危机前后交汇。进一步观察1998—2019年发达国家和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第二产业占世界比重变化率折线图(图20)可知,在次贷危机前,这种转移过程在总体加速,而在次贷危机后总体减速,且长期处于零水平上下波动。换言之,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迁移升级已在不断放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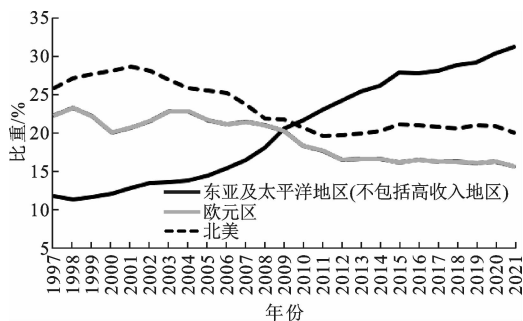


图19 1997—2019年部分地区第二产业占世界比重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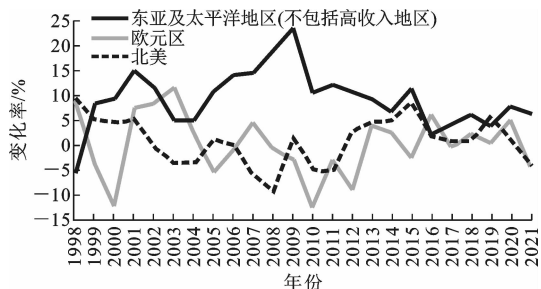


图 20 1998—2019 年部分地区第二产业占世界比重变化率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这主要是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雁头”不愿意带飞,发达国家觉察到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外流对国内就业和社会政治稳定的不利影响,开始实施再工业化与吸引产业回流等鼓励支持政策^[58]。在中美贸易争端中,美国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在其国际产业链中努力实现去中国化,提高美国自己的产业链比重^[59]。而这种发达国家的一致性行为正在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生产组织朝着非优化方向前进,也限制了世界范围内产业的梯度迁移升级^[60]。二是“雁尾”无力跟随,最不发达国家对产业转移的承接能力不足,尤其是存在缺乏基本技能以上的劳动力数量,国民中等教育水平较低,基础设施建设较差,农业生产率较低尚不能保障基本生存等问题,使其不能够像之前中等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那样有效地承接世界产业梯度转移。在这两方面的共同影响下,世界产业结构迁移升级愈加缓慢,不能有效地支持世界经济增长复苏。

(七) 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加剧

随着新兴经济体劳动力成本的快速提升,国际组织生产中的“成本洼地”势能正在不断下降。全球价值链发展加剧了国内存量分配朝着少数群体倾斜,使得那些在竞争中不能融入全球价值链结构的利益群体愈加走向了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61],出现了世界产业链从新兴经济体朝最不发达国家的转移尚未完成,发达国家就已经由于长期缺失中低端产业链而产生了民粹主义的现象。美国特朗普上台引发的贸易争端和英国脱欧给传统国际经贸

体系带来了巨大挑战。2013 年 WTO 达成的《巴厘岛一揽子协定》并没能获得实质性进展,2015 年 WTO 宣布放弃多哈回合谈判后未产生任何重要国际协议,原本预计 2020 年达成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渔业补贴削减谈判》也面临无限期被搁置的风险,WTO 上诉机构经历长期停摆。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促使各国实施更加严格的贸易管制,纷纷出台吸引产业回流和支持产业本地化的政策,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这使得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八) 世界各国财富分配不平等普遍扩大

尽管在宏观增长理论中如何处理分配与增长的辩证关系,一直是理论前沿的难题,但是普遍共识是分配差距对增长存在倒 U 型影响,即分配存在一定差距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当分配失衡加剧时对经济增长会有负面制约作用。世界不平等数据库显示,2008—2016 年全球收入最高 10% 人群的收入份额一直处于 50% 以上。与此同时,中产阶级的规模正在不断被压缩,在 OECD 国家中,中产阶级家庭所占人口比例从 1985 年的 64% 下降到 2015 年的 61%。观察 1995—2014 年世界部分国家前 10% 人群占国内财富份额折线图(图 21)可知,除了南非始终较高、法国始终相对较低外,俄美两国前 10% 人群占据的财富份额总体呈增长趋势,表明国内居民的财富分配失衡总体加剧。

从经济层面来看,收入分配不平等会减少总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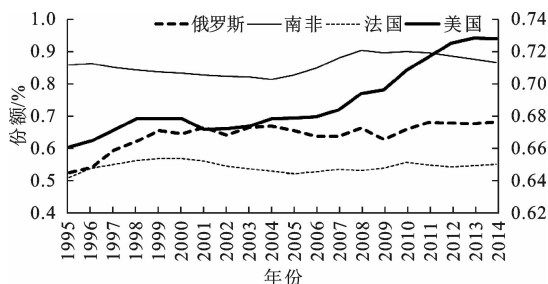


图 21 1995—2014 年世界部分国家前 10% 人群占国内财富份额

注:美国的指标出现在右轴,其余三国均出现在左轴。数据来源于世界不平等数据库。

求。边际消费倾向具有递减效应,当分配不平等加剧时,富裕人群的消费增加非常有限,而不富裕人群边际消费增长会变慢,且由于收入下降对预期的影响会使得储蓄倾向上升,投资需求降低^[11]。DABLA-NORRIS et al. 通过研究 1980—2012 年间 159 个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关系发现,中低收入阶层收入份额的上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增加会使得中短期内 GDP 增长率下降^[62]。而从政治层面来看,全球收入分配不平等会带来国内政治的不平等与“财富选票”的选举畸形,加速催生民粹主义并对国际经济和政治稳定造成冲击^[63]。而在社会层面,分配不平等所带来凝聚力和公平感降低会使得集体行动更难以达成一致,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应对重大风险危机时产生不利影响。分配不平等引起的社会阶级流动性降低也会进一步抑制中低收入群体的工作与创新积极性,削弱大众的企业家精神,加剧社会分层高度和分配不平等^[30]。

(九) 单一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结构性矛盾

当前世界货币金融体系以美元作为单一基础,世界上约 1/3 的国家主权货币以美元为锚定,2/3 的证券发行、外汇储备与新兴市场外债使用美元计价,1/2 的全球贸易以美元计价^[64]。美元是国际支付中使用率最高的货币,SWIFT 统计美元在国际支付中的比重在次贷危机后不断升高,近年长期维持在 40% 左右(图 22),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元占全球储备货币比例一直维持在 60% 以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观察 1985—2020 年美元指数走势曲线图(图 23)可知,次贷危机以来,美元指数持续处于低位,这对许多依赖于美元开展的经济金融活动带来了负面影响。

此外,单一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还存在两方面结构性矛盾。一是出于大量的跨国支付和国际储备需要,美国不得不维持经常项目的长期赤字,并通过私人部门资产证券化来加杠杆满足全球对美元的流动性需求,这形成金融危机的循环往复。而如今这个难题只是由私人部门加杠杆变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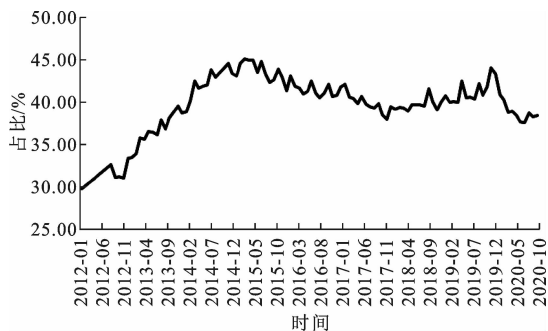


图 22 2012—2020 年美元国际支付份额占比

注:数据来源于 SWIF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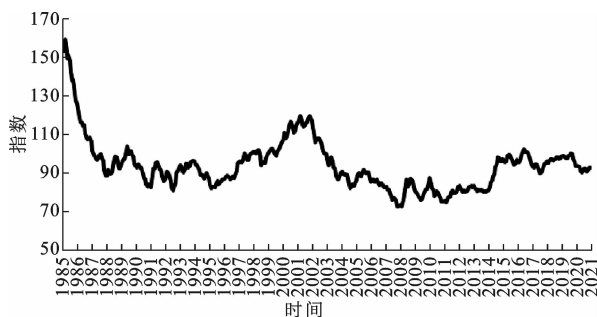


图 23 1985—2020 年美元指数走势

注:数据来源于雅虎财经。

美国政府加杠杆,其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并没有降低^[65]。二是这一体系会带来极其显著的美元周期,美元的虹吸效应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存在巨大损害,会进一步促使外商直接投资的短期化甚至投机化^[66],造成国际资本流动的不稳定并加剧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67]。

(十) 地缘政治风险频发

进入 21 世纪以来,各种各样地缘政治危机层出不穷。地缘政治风险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在于其带来巨大的经济和政策不确定性^[68],这样的“不确定性三位一体”将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不利影响^[69]。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显示^①,近 10 年来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持续上涨。地缘政治风险与政策不确定性正在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和金融波动的主要驱动力^[70],其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贸易流动和资本流动两方面。

① 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由 BAKER 等人于 2016 年构建,参见 <http://www.policyuncertainty.com>。

在影响贸易的因素方面,客观上战争、恐怖主义及某些地缘军事协定有可能导致部分或全部的国际贸易禁运^[71],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也会使得贸易的汇率风险增加,从而导致进出口商进行交易的沉没成本提升^[31,72],主观上使得进出口企业和贸易商考虑到安全和稳定因素从而减少国际贸易活动。在影响资本流动方面,地缘政治冲突中的“黑天鹅”事件会造成极端风险的溢出与资本流动的异常波动,并且对长期跨国直接投资造成严重冲击,加剧国际资本流动以为避险而增加的短期投机流动^[68]。例如2018年和2021年,在土耳其可能面临美国和欧盟制裁的风险下,国际资本流动短期内发生巨大波动,使得土耳其里拉崩盘,股市暴跌熔断。

三、突破世界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的四大对策

要解决世界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的困境,既需要从传统宏观增长动因着手,也需要针对新情况开展大力合作探索。总体来看,其中最为关键的突破路径包括4个方面。

(一) 世界各国形成更加负责任的国际经济与产业合作治理体系

从前面所述的动因来看,当前长期停滞的困境在很多方面都是源于新旧经济力量格局发生了变化,世界经济竞争加剧,而其中部分国家又采取了不负责任的竞争方式,致使世界经济难以真正复苏。世界经济新周期的持续稳定发展离不开公平合理、体现合作共赢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其核心是推动新型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转型和调整^[18,73]。只有世界各国政府积极通过国际协调安排来实现更优的全球治理,世界经济才能通过实现治理层面的结构性改革迎来新生契机^[74]。国际社会需要看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加快推动更高质量的区域经贸协议谈判进程^[75],全面回应新兴经济体的合理利益诉求^[32]。尤其是在国际经济与产业合作治理中要避免短视的保护主义思

维,应看到产业迁移的全球福利性,通过合作实现世界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从而促进全球生产组织的资源要素更优配置。

(二) 更为强劲的技术合作创新

在全球资本长期投资和劳动力供给都面临不断下滑的趋势中,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其关键在于技术进步^[76],尤其是能够引领产业结构重大调整的技术创新,例如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与应用^[16]。科技创新及全球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和产业变革是世界经济结构性调整及周期性转型的关键因素^[77]。从历史经验来看,尽管技术突破会在短期带来结构性失业,但劳动力配置都会在长期中找到全新的产业就业,实现更优的产业结构升级。在没能实现重大新技术突破前,也要加快技术应用层面的创新推广,例如加强“互联网+制造业”模式融合发展,提高传统制造业的效率^[17];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降低社会成本并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78]。在开展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应摒弃短视的单一竞争性思维,积极采取合作开放的态度,才能真正避免闭门造车,实现世界范围内技术创新的更优组织。

(三) 积极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

全球范围内国家间的分配不平等与国家内部的分配不平等会对总供给和总需求同时带来严重制约^[26],致使实际增长率无法得到有效提高。尤其是在当前实际利率长期低迷、货币政策空间日益有限、政府债务不断高企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需要考虑积极开展改善分配不平等的长期结构性改革^[23-24]。尽管这种结构性改革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79],但通过改善分配不平等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同时可以形成一个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这有利于更好地释放居民消费潜力^[33]。在解决分配不平等的过程中,尤其要重视托底政策。例如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公平的教育环境^[8],通过税收制度改革扩大低收入者税收减免^[80]等。

(四) 重视加强国际金融治理合作

在当代社会,国际金融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影响重大。国际金融治理的不确定性加剧使得全球经济秩序始终处于一种不安或焦虑状态之中。长期资本投资受限和短期投机主义盛行会推动长期资本投资的收益率不断升高和短期资本投资收益率不断降低,形成失衡的收益率曲线结构,这种结构在面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等极端事件时更加缺乏应对能力。加强金融政策协调、风险防范合作与资本流动监管合作、实施更负责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对于世界经济增长脱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81]。

四、结语

全球次贷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经济增速长期低迷、贸易增速总体下降、FDI 较为低迷及结构分化不断加速、发达国家持续面临通缩压力而发展中国家通胀依然较高、全球失业压力持续高悬、全球粮食危机频发及基本生存需求短缺加剧、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等特征问题,都表明世界经济增长已经陷入长期停滞的困境中。

本文通过宏观历史数据分析,发现相较于既往经济周期中能够在几年内实现复苏的一般经验,当前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困境的原因不仅仅是短期需求的下滑,而是供给侧方面更加影响深远的成因,主要包括政府债务不断增长、世界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放缓、技术进步的推动力不断下降、新旧能源替代的产业冲击、世界产业结构迁移升级愈加缓慢、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加剧、世界各国财富分配不平等普遍扩大、单一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结构性矛盾、地缘政治风险频发等10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本文进一步提出了世界经济增长要从长期停滞中脱困的可行方向,包括亟需形成更加负责的国际经济与产业合作治理体系,开展更为强劲的技术合作创新,积极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重视加强国际金融治理合作。

只有先充分改变这四项制约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制度性、结构性关键约束,才能进一步改善投资供给、人力资本、人口年龄结构等内生性动能。然而从目前的世界政治竞争与经济竞争格局来看,竞争思维仍然大于合作思维,保护主义思维仍然大于开放思维,要实现这四项目标并不容易,甚至可以预测在短期内世界经济长期停滞的现象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需要全面加快自身的制度性与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改革开放40多年来积累的发展经验,在改善分配平衡、促进教育公平、加快技术创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扩大劳动力供给能力、完善金融体系、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引导,占据世界供给侧改革的先机,抢攻新一轮重大技术创新突破的新高地,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提供充足的动力。本文从世界宏观历史数据出发,对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可能陷入滞涨风险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与预测,为面临未来世界经济形势不确定时,中国采取应对策略提供了一定参考。当然,世界经济增长是一个宏大的议题,本文也并不能将所有的影响因素一一展开分析,并且缺少微观数据对路径机制进行解构重构,需要进一步通过长期数据跟踪与微观数据集构建形成新的研究路径。

参考文献:

- [1] DELPACHITRA S, VAN DAI P. The determinants of TFP growth in middle income economies in ASEAN: Implication of financial cris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2012, 11(1): 63-76.
- [2] ERTUGRUL Y, ALPER A.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SA: evidence from renewable energy[J].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2, 16(9): 6770-6774.
- [3] JORGENSON D W, HO M S, SAMUELS J D. What will revive U. S. economic growth? lessons from a prototype industry-level production account for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14, 36(4): 674-691.
- [4] WANG S X, FU Y B, ZHANG Z G.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J]. China econom-

- ic review, 2015, 36(4):146-165.
- [5] CETTE G, FERNALD J, MOJON B. The pre-great recession slowdown in productivity[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6, 88(3):3-20.
- [6] MAESTAS N, MULLEN K J, POWELL D.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economic growth, the labor force and productivity[EB/OL]. (2016-08-01)[2022-06-03]. https://www.rand.org/pubs/working_papers/WR1063-1.html.
- [7] 汪伟. 人口老龄化、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J]. 经济学(季刊), 2017(1):67-96.
- [8] 许长青, 周丽萍. 教育公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1978—2014年数据的经验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17(10):28-40.
- [9] 云喆, 张茹茹, 周鹏. 人力资本抑或创新创业:中国经济转型的内生增长路径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20(9):12-25.
- [10] COWEN T. The great stagnation: how America ate all the low-hanging fruit of modern history, got sick, and will (eventually) feel better[M].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11.
- [11] SUMMERS L U S. Economic prospects: secular stagnation, hysteresis, and the zero lower bound[J]. Business economics, 2014, 49(2):65-73.
- [12] GORDON R J. A new method of estimating potential real GDP growth: implications for the labor market and the debt/GDP Ratio[EB/OL]. (2014-09-03)[2022-10-26].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490835#.
- [13] GORDON R J. Secular stagnation: a supply-side view[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 105(5):54-59.
- [14] BING W, JOHN F. The recent rise and fall of rapid productivity growth[EB/OL]. (2015-02-09)[2022-09-21]. <https://www.frbsf.org/wp-content/uploads/sites/4/el2015-04.pdf>.
- [15] ANDREWS D, CRISCUOLO C, GAL P N. The best versus the rest: the global productivity slowdown, divergence across firms and the role of public policy[EB/OL]. (2016-12-09)[2022-06-01]. <https://www.oecd-ilibrary.org/content/paper/63629cc9-en>.
- [16] ACEMOGLU D, RESTREPO P. Secular stagnation? the effect of aging o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age of autom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107(5):174-179.
- [17] 陈长缨. 全球生产率“减速”与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EB/OL]. (2018-04-21)[2022-03-08]. <https://xianxiaio.ssap.com.cn/catalog/1599372.html>.
- [18] 宋佳音, 谭璇, 范志勇. 长期停滞及其应对方案——基于“全球化深化”的视角[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0, 11(4):161-179.
- [19] SCHMITT-GROH S, URIBE M. The optimal rate of inflation[EB/OL]. (2010-01-30)[2022-07-08]. <https://core.ac.uk/download/pdf/24061168.pdf>.
- [20] OMAI T, KAN E Ö. Re-examining the threshold effects in the inflation-growth nexus with cross-sectionally dependent non-linear panel: evidence from six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J]. Economic modelling, 2010, 27(5):996-1005.
- [21] REINHART C M, ROGOFF K S. Growth in a time of deb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2):573-578.
- [22] COIBION O, GORODNICHENKO Y, WIELAND J F. The optimal inflation rate in New Keynesian Model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2, 79(4):1371-1406.
- [23] WOLFF G B. Monetary policy cannot solve secular stagnation alone[EB/OL]. (2014-09-27)[2022-06-01]. <http://gesd.free.fr/cepr2014.pdf#page=147>.
- [24] TEULINGS C, BALDWIN R. Secular stagnation: facts, causes and cures[EB/OL]. (2019-09-11)[2022-06-01]. <http://gesd.free.fr/cepr2014.pdf>.
- [25] EGGERTSSON G B, MEHROTRA N R, SINGH S R, et al. A contagious malady? open economy dimensions of secular stagnation[J]. IMF economic review, 2016, 64(4):581-634.
- [26] 权衡. 世界经济结构性困境与发展新周期及中国的新贡献[J]. 世界经济研究, 2016(12):3-11.
- [27] CHECHERITA-WESTPHAL C, ROTHER P. The impact of high and growing government debt on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for the Euro Area[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2, 56(7):1392-1405.
- [28] 何德旭, 张斌彬. 全球四次债务浪潮的演进、特征及启示[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1, 38(3):43-63.
- [29] SUMMERS L H. Demand side secular stagnation[J].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2015, 105(5):60-65.
- [30] EVERS J H M, IRON D, KOLOKOLNIKOV T, et al. Agent-based model of the effect of globalization on inequality and class mobility[J]. Physica D: nonlinear phenomena, 2017, 361(8):35-41.
- [31] HANDLEY K, LIMA O N. Trade and investment under policy uncertainty: theory and firm evidence[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15, 7(4):189-222.
- [32] 李晓, 丁一兵. 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困境与中国经济增长转型[J]. 社会科学文摘, 2017(10):47-49.
- [33] 蔡昉. 中国经济如何置身全球“长期停滞”之外[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9):4-22.
- [34] BALDWIN C Y. The mirroring hypothesis: linkages inside and across transaction free zones[EB/OL]. (2020-08-12) [2022-06-01].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690592.
- [35] 赵丽娜. 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与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J]. 理论学刊, 2021(1):59-68.
- [36] TAYLOR J B. Discretion versus policy rules in practice[J]. Carnegie 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1993, 39(1):195-214.
- [37] 许平祥. 经济虚拟化与长期停滞的困境[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4):64-73.
- [38] 殷波. 中国经济的最优通货膨胀[J]. 经济学(季刊), 2011, 10(3):821-844.
- [39] 贺力平, 马伟. 论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汇率变动与贸易增长[J]. 金融评论, 2016, 8(6):1-19.
- [40] EICHENGREEN B. Secular stagnation; the long view[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 105(5):66-70.
- [41] EDEN M, KRAAY A. “Crowding in” and the returns to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low-income countries [EB/OL]. (2014-02-01) [2022-06-01].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690592.
- [42] TURNER A. Central banking after the crisis; no return to past certainties[J]. Business economics, 2015, 50(3):114-127.
- [43] 张明, 郑英, 敬云川. 欧债危机的现状评估、政策选择与演进前景[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2(3):24-38.
- [44] 谢世清, 向南. 从欧债危机的影响看欧元区的发展趋势[J]. 宏观经济研究, 2018(1):156-163.
- [45] KUMAR M, WOO J. Public debt and growth[J]. Economics, 2015, 82(328):705-739.
- [46] 郑君君, 朱德胜, 关之焯. 劳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中国9个省市的实证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4(4):149-159.
- [47] 周祝平, 刘海斌.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J]. 人口研究, 2016, 40(3):58-70.
- [48] CHUI M, MANYIKA J, MIREMADI M. How many of your daily tasks could be automated? [EB/OL]. (2015-12-14) [2022-06-01]. <https://hbr.org/2015/12/how-many-of-your-daily-tasks-could-be-automated>.
- [49] GORDON R J. The Demise of U. S. economic growth: restatement, rebuttal, and reflections [EB/OL]. (2014-02-21) [2022-05-08]. <https://www.nber.org/papers/w19895>.
- [50] 夏先良. 当前应做好全球经济陷入严重危机的战略准备[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0(8):62-79.
- [51] LOECKER J D, EECKHOUT J. The rise of market power and the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0, 135(2):561-644.
- [52] CLIFFORD KRAUSS. Saudi oil price cut is a market shock with wide tremors [EB/OL]. (2020-03-09) [2022-06-01].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09/business/energy-environment/saudi-oil-price-impact.html>.
- [53] CORCORAN E. Re-engaging Russia [EB/OL]. (2020-04-09) [2022-06-01]. <https://fpif.org/re-engaging-russia/>.
- [54] RAZZOUK N. OPEC + talks collapse, blowing hole in Russia-Saudi alliance [EB/OL]. (2020-03-06) [2022-06-01]. <https://www.bloombergquint.com/business/opec-fails-to-reach-deal-as-russia-refuses-deeper-oil-cuts>.
- [55] OCAL O, OZTURK I, ASLAN A. Coal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urke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ergy economics & policy, 2013, 3(2):193-198.
- [56] BATLLE C. A method for allocating renewable energy source subsidies among final energy consumers [J]. Energy policy, 2011, 39(5):2586-2595.
- [57] 蔡万刚. 世界主要经济体产业结构变迁: 路径与演化研究[J]. 河南社会科学, 2020, 28(4):2-10.
- [58] 郭强, 张明, 董昀. 美国经济长期性停滞: 现状、根源及

- 对策分析[J]. 国际经济评论,2017(1):141-159,7.
- [59] 姚曦,赵海,徐奇渊.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排除机制对产业链的影响[J]. 国际经济评论,2020(5):26-42.
- [60] SUYANTO S, SALIM 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pillovers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the Indonesian pharmaceutical sector: firm level evidence[J]. Applied economics, 2013, 45(3):383-395.
- [61] 管传靖. 全球价值链与美国贸易政策的调适逻辑[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11):118-155.
- [62] DABLA-NORRIS E, KOCHHAR K, SUPHAPHIPHAT N, et al.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J].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s, 2015, 15(13):1.
- [63] MILANOVIC B. Increasing capital income share and its effect on personal income inequality [R]. LIS working papers, 2016.
- [64] GOPINATH G, STEIN J C. Banking, trade, and the making of a dominant currency[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1, 136(2):783-830.
- [65] SCHWARTS A J. Globalizing capital: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98, 58(2):617-618.
- [66] 张明,李曦晨. 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转变:从旧“三位一体”到新“三位一体”[J]. 国际经济评论, 2019(5):80-98.
- [67] CARNEY M. The growing challenges for monetary policy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EB/OL]. (2019-08-23) [2022-08-08]. <https://www.bis.org/review/r190827b.pdf>.
- [68] 程实,张明,陈兴动,等. 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新周期还是旧周期[J]. 国际经济评论, 2018(2):24-51.
- [69] CARNEY M. Uncertainty, the economy and policy [EB/OL]. (2018-02-24) [2022-06-01]. <https://www.bis.org/review/r160704c.pdf>.
- [70] CALDARA D, IACOVIELLO M. Measuring geopolitical risk [J]. FRB 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 2018.
- [71] GLICK R, TAYLOR A M. Collateral damage: trade disruption and the economic impact of war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0, 92(1):102-127.
- [72] 许锐翔,许祥云,施宇.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全球贸易低速增长——基于引力模型的分析[J]. 财经研究, 2018, 44(7):60-72.
- [73] 竺彩华. 市场、国家与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重构[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9, 36(5):1-33.
- [74] 袁志刚,郑志伟,葛劲峰. 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困境与出路[J]. 学术月刊, 2020, 52(8):67-82.
- [75] 王碧珺,刘晓欣.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助力高水平开放[J]. 中国金融, 2021(3):48-50.
- [76] 汤铎铎,刘学良,倪红福,等. 全球经济大变局、中国潜在增长率与后疫情时期高质量发展[J]. 经济研究, 2020, 55(8):4-23.
- [77] LI H, LOYALKA P, ROZELLE S, et al. Human capital and China's future growth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7, 31(1):25-48.
- [78] 崔俊富,陈金伟. 数据生产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J]. 管理现代化, 2021, 41(2):32-34.
- [79] 邹静娴,申广军. 金融危机后“长期停滞”假说的提出与争论[J]. 国际经济评论, 2019(4):26-43.
- [80] 袁佳,高宏. 中国居民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及改善对策[J]. 新金融, 2021(1):18-22.
- [81] 张明. 世界经济中的“三低两高”现象[J]. 金融博览, 2021(4):40-41.

(责任编辑:杨南熙)